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决定编选一部新中国主题诗歌选集，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委托我承担具体编选工作。我深感荣幸，也感觉到任务的艰巨。这部诗歌选本，是在收集出版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来歌唱、吟诵新中国的诗歌作品，展现诗歌与祖国同行的壮美历程，向伟大祖国献礼！

在70年的时间长河里，歌唱新中国的诗歌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那么，从哪里入手和采取什么样的结构来呈现，这是一件颇费思量事情。我受领任务之后，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边查资料边构思这部诗选的体例，最终确定了该选本的框架结构。

以前，我们常说过的一个比喻是：新中国是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巨人，有他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它的孕育、诞生、建设成长、改革开放、伟大复兴……每一步都在诗歌里留下了清晰而生动的印迹。这便为此项目主体工程——为新中国编选诗歌的花环，提供了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现实可行性。在这项工作中，我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在新中国以往各个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的诗人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孕育和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诗人群，而诗人们也为自己国家的日新月异、繁荣富强而放声歌唱。诗人爱祖国，就像爱自己的母亲，热烈、庄重，发自内心。反观当下现实状况，虽有一种“今非昔比”之感，但对诗歌的独特作用，我们仍不可忽视和低估。

诗歌里的新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新中国主题诗歌，是与新中国的孕育、诞生、发展相联系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同步关系。新中国主题诗歌可以说是新中国发生发展历程的记录和见证。在内容结构上，我尝试将这部主题诗集分为六个部分，也可以称之为六部曲、六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孕育：赤潮曲”，第二乐章为“诞生：时间开始了”，第三乐章是“成长：向困难进军”，第四乐章为“开放：报春鸟衔来了火焰花”，第五乐章是“抒情：我和我的祖国”，第六乐章为“圆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做既贯穿了全程，又落脚到了当下。按照这样的结构划分，不难看出编者的意图。在此，我愿向读者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是入选作品的的时间实际上突破了70年的

新中国主题诗歌选集《永远的新中国》

## 诗颂祖国 致敬经典

□杨志学

时间框定。因为我们是新中国的“孕育”算起的，是从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的蓬勃兴起算起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斗争历程算起的。可见，把反映新中国主题的诗歌作品从“孕育”算起，是一种合理的而又必要的延伸。而这一阶段的诗歌，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意义、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第一乐章的诗歌作品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革命领袖、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当年的诗作，如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一系列诗词，瞿秋白的《赤潮曲》等。二是革命烈士的诗。如殷夫的《别了，哥哥》，叶挺的《囚歌》，白深富的《花》等。三是进步文人的诗作。如艾青的《他起来了》，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苏金伞的《地层下》，蔡其舜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等等。

二是几个乐章的排列，大致遵循了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但也有需要说明的地方，第四乐章选取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按说改革开放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在第四部分，我们侧重选取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前期的作品——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诗歌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诞生了众多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名篇佳作。改革开放后期以至于当下作品被置于本书最后一部分即第六乐章来做呈现。第六乐章“圆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在反映当下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而第五乐章“抒情：我和我的祖国”是贯穿新中国产生和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部分，因此类作品较多，故在此专门列出一辑，作为强化。

三是关于几个乐章名称的由来。第六乐章的名称取自毛泽东的诗词，其余均来自各乐章里入选的一首诗词的篇名。这几首用作小辑名称的篇名，也确实自然天成，可遇而不可求，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均喊出了各自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极强的在场感和极

大的概括力。

以上编选思路和全书框架结构确定后，可以说此书编选工程就成功了一半。后面属于资料查找和作品落实环节，主要是工作量和时间分配的问题了。

以下是我作品筛选和诗集编辑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因为是一条70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之河，其厚重的历史感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尽管，向新中国70年献礼，我们汇集当下许多歌唱新中国的作品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许多单位和报刊的征文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毕竟历史感缺乏，也少了时间的积淀。而以70年甚至更长时间积淀而来的一束束诗歌之花，编织成继往开来的敬献的花环，便具有审视历史、致敬经典的味道，也是献给祖国70年华诞的更有分量的礼物。但回望历史，也必须落脚到现实。历史的声音要能依然穿透岁月的长空，历史的光芒要能依然照耀现实的大地。今人的行为，是向前辈诗人表示敬意；而同时，作为历史遗产，前辈诗人的作品也是对今人的激励和抚慰。谁敢说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只具有历史意义呢？它们不是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警示作用吗？同时，其雄壮慷慨的美学品格也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效应。

其次，文献与文本兼顾的原则。面对图书馆里几十年前一摞摞泛黄的报刊，一部部落满了尘埃的诗集，一方面，我们对前辈诗人表示应有的仰望和足够的敬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行使裁决的权利。我们要求文献价值与文本价值的尽可能的统一。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名人篇名，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国旗》、冯至的《韩波歌》、贺敬之的《三门峡一统收台》《桂林山水歌》、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雁翼的《在云彩上面》、乔羽的《我的祖国》、李瑛的《我

重新认识了祖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罗德里格斯的《中国人民的手》等等，因其文本的超越价值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它们的人选自然在情理之中，也为读者所期待；同时，我们也不遗憾地看到一些诗人的诗作多，但有一定的记录历史的文献意义，但由于明显的历史局限或表达缺憾而黯淡乃至熄灭了审美之光，我们也只好放弃。

第三，约定俗成与新的发掘相结合的原则。在选取较多为大家所熟悉的诗歌名篇的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拨开历史的风尘，发掘一些被时光掩埋了的诗歌珠贝。比如对诗人郭沫若，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他《女神》时代的作品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篇，而编者寻觅到的另一首诗《战声》在主题内容上更适合入选第一乐章“赤潮曲”之中。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写下的《太阳要永远上升》，也是一首险被岁月风尘掩埋的诗，被编者在《人民画报》1950年10月号发现。可以说这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欢呼新中国诞生的作品，而其笔法的浪漫气度也与诗人早期风格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同样让编者感到惊喜的是在该期《人民画报》还发现了井岩盾的以散文诗形式完成的《贺电》，这也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欢呼之作”。还有，“九叶诗人”杜运燮，他在解放前夕的作品一般更受人关注的是《滇缅公路》《闪电》等，而编者比较之下则认为《无名英雄》更好，也更具文本价值。同属“九叶诗人”的穆旦，他的《赞美》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而他反映新中国早期建设成就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则相对陌生。七月派诗人绿原，在他晚年，在崭新的历史时期，写出了《送驻港部队一盆月季》这样亲切而耐读的作品。入选这部诗集，让人有发现之喜的作品，还有公刘的《炊烟》、梁南的《报春鸟衔来了火焰花》、叶延滨的《国际饭店下的一条小巷》等，尽管有的还不敢说就是“珍珠”和“精品”，但它们的人选是恰当的，也使本书得到丰富并增加了亮点。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尽管编者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资料及目力所限，加之时间匆促，还有诸多名篇佳作未能入选，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诗人和读者朋友谅解并批评指正！

一束束诗歌的朋友，见证了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带给人阅读和朗诵的美感，陪伴我们走向未来。

陈霁《雀儿山高度》

## 贵在追求高度

□马良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前夕，我读到了陈霁新书《雀儿山高度》。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佳作。正如阿来所言，它“拥有相当高的精神品格和文学质地，和某些同类作品拉开了距离”。

《雀儿山高度》的“高度”，是指书中作为大自然的雀儿山之高之险，雪山邮路之艰难；同时，也喻指书中英雄其美多吉所达到的人格的高度；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作者陈霁的写作期许：即便是一本应邀之作，一个负责任、高水平的作家也会交出一份使命之作，达到一部文学作品应有的高度。

那么，陈霁是如何做到的？写作的时间相当紧迫，从接到邀约到完成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但是陈霁还是在短时间内调动起自己的所有能量，诸如他亲自开车体验邮路的艰辛，对主人公工作、生活环境及其周边人比较扎实的采访，等等。作者写这部作品时，有相对于其他作者较为宽广而独特的文化视野，即所谓“功夫在诗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短时间内做的功课远较常人复杂，甚至超过了约稿者和写作对象的预期，他们惊讶于陈霁采访点、关注点以及呈现上很多独特的、广博的视角。

陈霁的著作《白马部落》写出了白马民族的心史，他不仅曾在白马部落长期蹲点，与形形色色的白马人交朋友，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且他具有学者识力，从而历史上首次对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部落做了文学乃至文化一历史一民族学的描述。在探讨白马藏族或者氏族复杂的民族关系时，陈霁对藏文化也有所涉猎。在《雀儿山高度》的写作中，陈霁很好地化用了这一切。作者将主人公其美多吉这样一个既平凡又传奇的英雄，搁置到他成长的环境背景中去，从他的自我、家庭、生长的地方、工作的环境、朋友同事以及他所处时代这样一个复杂的“场”去一点点地捏塑起英雄的立体形象。

其美多吉生长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这里既是藏族史诗英雄格萨尔的故乡，德格印经院又是藏族文化大百科全书，是紧追拉萨和日喀则的文化圣地。这看似与主人公成长经历无直接关联的背景，其实正是作者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的独特追求，那就是追溯其美多吉成长的深层文化结构。

德格产生了降央卓玛、尼玛泽仁·亚东这样享誉全国的音乐人，其中亚东还是其美多吉的儿时好友。两人长相近似，多吉本人歌喉也远超常人，但是就像歌唱是亚东的生命一样，多吉的最爱却是汽车。他在经历了一番既平凡又曲折的少年、青年成长经历后，只有当他的汽车梦让其寻找到真正的自我之后，他才从一个品性优良的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守高原雪线邮车的平民英雄，他身上的格萨尔基因才得以完全释放，而他今作为德格形象代言人的光芒才逐渐放射出来。也诚如陈霁所言，“其美多吉的英雄情结，他的利他主义，他的坚韧不拔，其实就来自这片土地。”

作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的雀儿山，是甘孜—德格邮路的必经之地。它是甘孜县、甘孜州、四川省甚至全国最高最险的一段干线邮路。作者的通篇描写均极具质感，尤其在描写雀儿山时不主要采用景物描绘，而是通过邮路负责人生龙活虎的精彩叙述、吕幸福等人不幸遇难的事例等等，将雀儿山的雪崩、“风搅雪”等自然环境恶劣、艰难乃至凶险，袒露无遗。不光是“行路难”，且不时出没的劫匪，更是令雀儿山邮路惊心动魄，其美多吉就曾为保卫邮件遭十多个匪徒砍成重伤，靠着超强的体质和毅力，不仅从死神的手中挣脱，还用破坏性康复疗法奇迹般地恢复，并于一年多后重回邮车。前一阵从陈霁的朋友圈内看到多吉开着邮车将运往武汉的物资运抵江城的报道，感觉《雀儿山高度》有了续篇。

从其美多吉的成长轨迹看，英雄性格无疑是他为主线，他选择邮车，选择雀儿山，选择与歹徒搏斗，选择与“残疾”抗争，无不是这么一份英雄情结的闪光。陈霁也紧扣这一主调。但一来英雄不是孤立的，陈霁从成长环境、家庭、邮车群体、五道班群体等，多点着墨，不仅令多吉的英雄形象格外突出，同时也描绘出英雄的群像。爱情、亲情、兄弟情、民族团结情、家国情等，又让整部书既洋溢着英雄交响曲的高亢豪迈，还有着凡人叙事诗的细腻委婉，还原了一个可敬也可亲的“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

陈霁曾有感，“其美多吉故事本身的质朴真实，不同凡响，在于他对理想30年如一日的坚持，让他的讲述自然地具有了令人感动的强大力量。”一方面，几十年与车相伴，“邮车是多吉骨子、灵魂里、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邮车，等于要了他的命”。另一方面，长子的突然离世、匪徒的刀棍交加都曾令多吉的肉肉之躯濒于危难……多吉的英雄事迹，发掘得比较晚，我们甚至看到他见义勇为负重伤后的救治，还是自己家人卖了一套房产付了高额医疗费，而他还在法庭上放弃了经济赔偿，且要求法庭轻判那些因贫困而犯罪的年轻人，这更让人看到了多吉身上的宽广悲悯的大情怀，正是由这几十年的坚守，这上百万公里的艰难车程的累积，才让人倍感多吉的不易与伟大！

几天前与人谈文论艺时时常有感而发：文学艺术家，其基点，绝不仅仅是手头上、口头上、笔头上的那点技艺功夫，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复杂一些、深刻一些的问题，或者说应该复杂、深刻地去思考一些问题，而不是同质化的、低思想含量的表达。

我是从陈霁此书以及其人有感而发的。也非常有幸，有像陈霁这样的文学艺术家始终保持着对高度的坚守和追求。

读一篇非虚构作品，数度泪奔。

回忆父亲的文章看得多了，尤其是每年的父亲节，几近泛滥，空无物色的多，煽情者众，鲜有真正打动人心。不料，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以平实的语言真实的场景真挚的情感深深吸引了我，越往下读越是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感同身受之处，不知不觉泪流满面甚至哽咽恸哭。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伤和痛，那些苦和累，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我以为已经远去了，却在作者的文字中突然如此鲜活，如此亲近，山呼海啸一股扑面而来。

在“省尾国角”广东省饶平县西厢乡的一个小村庄，烙印着父亲的一生。平凡、朴实、勤劳、刻苦，跟中国乡村的大多数父亲一样。山一样的脊梁、顽强的意志、乐观的天性，不甘平庸不服输，犹如贫瘠山梁上的一棵草，生而弱小卑微，却把根深扎土地，任凭凛冽的山风吹过，寒冷的霜雪埋过，当太阳升起，当雨露滋润，生生不息的希望就在体内升腾，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

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亡，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残酷得令人泣血的现实，有柔软如流水的温情。不仅是父亲，还有文中出现的众多人物，母亲、哥哥、友友、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下坝嫂、生产队长、伯父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有的即使是三言两语，人物性格也跃然纸上。

“这些自产自销的土烟丝，父亲随身携带一小油纸袋，放在裤袋里，犁好一片田，赶过一段路，中间歇息时，卷一支喇叭筒，猛吸几口，既解乏，又过瘾，那大约是父亲人生中的赏心乐事和莫大享受。”这样的描述不少，画面感很强，让人不知不觉走了进去。

一方水土一方人，作者对潮汕人文风物的熟悉，让作品洋溢出浓浓的乡土特色。在写生到生“男丁”烟“分饭”的习俗时，更是驾轻就熟，娓娓道来。

按照村里的传统，生男孩的，正月十一还要上灯，宰鸡杀鹅，糍圆做饼，答谢神明；正月十六，要主持或参与“营阿娘”，如果是头丁，就要牵头筹备有关事务，不是头丁，就协助头丁做好相关工作，让“阿娘”在全村的疆界巡游一番，以示香火有继，福泽绵长。

建新房上梁，在中国各地都是一件庄严肃重的事情。在作者笔下，潮汕人“上梁”是这样的：

随着张成丰将象征大吉大利的红花辣草水洒向正梁时，父亲高喊一声：“吉辰到！”负责做泥水的父亲的族弟张继添随即点燃了一串鞭炮，张永平紧跟喊道：“上梁！”在一片热烈的鞭炮声中，大家用绳子将正梁慢慢地抬高、抬高，然后稳固地放在整个屋子的最高点。正梁安放妥当后，张永平遂将一张写有“姜太公在此”的红纸贴在正梁中间，这道庄严的仪式方才完美落幕。

父亲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农耕文明的质朴淳厚，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果不是对乡土文明深厚的感情，如果没有经受过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如果不是对这一方热土的文化底蕴有着长期的研究和积淀，不可能这样信手拈来如数家珍。非虚构作品的本质就是真实地再现，高明的作者总是能把握核心，那就是文学艺术的以情动人。理性冷静的铺陈，蕴含着博大的悲悯情怀；感性真挚的描述，深藏一颗柔软的心。父亲去当挑夫，那似乎通到天边的崎岖山路，父亲的双脚沾得如此沉重：

从大赤岭下来，经过枫树脚岭，在岭上路窄坡陡，货担沉重，无法走快，刚刚下到食饭溪水库主坝时，父亲急着赶路，想走快一些，没想到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壳楼侧翻，幸好是在平地，损失不大，只豁坏了三个鸡蛋。父亲就势坐在地上，捧着几颗砸坏了的鸡蛋，左右右瞧，舍不得丢掉，遂把那几颗生鸡蛋吃了再赶路。

后来，哥哥张培林长大了，开始为父亲分担了，假期跟着父亲当挑夫：

父子俩刚踏上江西田村后头的晒谷场，天就阴阴地下了雨，晒谷场从上场到下场有一截很窄很陡的坡，每次经过时都要挑直肩才能顺利通过，雨过路滑，担子又重，张培林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到路尾时终于刹不住脚，连人带担子滑倒在地，40多斤的一担鸡蛋坏了一大半。

作者自己考上中师，第一天去报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由于家里穷，没有现金可缴纳，只能用柴草之类代替。那天报到时，我和父亲每人挑一担粗糠（即谷糠）到学校，上午等不到人，进了门，我们父子俩就一直在校门口等着。中午就近在小食摊上吃一碗三烧饺，一毛钱十三颗，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见我不够吃，又舍不得多花钱，就把他那一份多拉几颗给我，我不肯要，他就把那半碗连汤带饺子都倒进我碗里，我是和着泪水把那半碗饺子吃完的。

父亲的友友在伐木的时候遭遇事故，悲惨的情景，人生的无常，着墨不多，却令人扼腕：

众人七手八脚把张两愿抬回刚刚搭好的篷寮，父亲连忙舀一碗水喂他，喂到一半，水就直往外流，喂不进去了。父亲和大家带着哭腔急喊：“两愿！两愿！”

张两愿却永远地闭上眼睛，听不到他的乡亲、他的兄弟一声声悲痛的呼喊！

这一天是冬至，他的儿子才两岁，他的妻子正做好冬至的汤丸等待他回去团聚。

没有刻意的夸张，没有故作的情，只是轻轻地道来，已经令人热泪纵横话不能言。哪些事件该洋洋洒洒，哪些故事该点到即止，体现出作者的独具匠心。将近4万字的篇幅，一点不觉得长，反而在掩卷之余，意犹未尽。

审视和反思，又让作品有了深度和张力。口述历史的角度，广阔的视野，哲理的思考，游刃有余的文字驾驭能力，活色生香，引人入胜。

张培忠《永远在路上》

真实的力量

□逸野

来自扶贫一线的文学经验

——评杨遥近作

□王朝军

《大地》是杨遥的长篇作品，刚刚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5期。正是作者的这种厚实携带着他“对大地”的热情，铺伸出一条庄重而丰饶的写作之路。杨遥有他经验的大地，那是中国北方乡村和安居于乡村内部的伦理秩序，是从农村迁城市的秩序变轨，也是对城市生活的价值认领。也就是说，杨遥在不知不觉中，亲身践行了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典型叙事。现在，这个典型叙事又更新了它的议程：反哺农村。“脱贫攻坚”便是反哺农村走向深入的基础“情节”。这一次杨遥依旧有缺席，下乡挂职扶贫和为写报告文学作品《掷地有声》而实地采访的经历，将他纳入了宏大叙事的历史现场。

作为一名小说家，杨遥深知，文学经验并非对生活经验的简单处置，他必须探入经验的内部，在庞杂纷乱的材料中挑选出细节和意义，并赋予它审美的形式。而所有的工作都指向一个中心，即人的秘密。

是啊，人很复杂，你不可能抛开一个人的上下文去核实他、确认他，那是“现象造人”；你也不可能将人剥离地境，按既定期程序左右他的行踪，那是“观念造人”。在这两点上杨遥保持了足够的警觉。于是我们看到了陈继清《墓园》，看到了张小飞《从前是一片海》，看到了“父亲”《父亲和我的时代》。他们在小说狭窄的空间内呼吸，挣扎，负重前行，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终极信念：过上好日子。

我知道有人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小说的根本志趣已经与“日子”无关，与吃饱穿暖这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无关，他们要的是精神，纯粹的精神体验。对此我表示同意，但生活未必同意。理由是拒绝“日子”，就等于拒绝了生活。而我们的小说，在拒绝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无比的坚决，结果，大量的“伪生活”以反映生活的名义被制造，被消费。

《父亲和我的时代》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直到小说收尾，‘隐疾’才找到它真正的落点：“听着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隐疾》。”

杨遥试图重新确立个体与他人、与世界和时代的关系。他的解决方案是让个体参与到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比如“父亲”，他不是贫困户，但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精神的贫困。这种明确的自我认知，是他率先在精神上“脱贫攻坚”的源动力。他的“偏执”、进取和紧跟时代的选择，有力地重申并确认了劳动的尊严和美好。劳动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抵抗虚无、完成自己的有效路径。当然，这种劳动是标有时代印记的新型劳动，微信、快手、抖音、微商，这些信息科技的产物，与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工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随之也覆盖到了他和他周围的人们，包括贫困户。于是，个人叙事溢出了他的边界，在集体的方向上找到了实然的表达方式，并最终进入时代精神的核心地带。杨遥确信，站在这个起点上，人，将摆脱“隐疾”，走向广阔大地的庄严之所。

这也是长篇小说《大地》的主题。“孤城”这类封闭贫穷的乡村世界，的确需要有人来帮扶，资金、技术、水电路网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反哺”手段，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激活人的内生动力。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长期驻村的深層目的便在于此。所谓“扶贫先扶志”，确实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

扶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安欣，一个处于社会资源结构边缘的弱女子，能否胜任？杨遥时刻注视着她的行动，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具象表达，浩大降临的事物将在这种表达中确认它的色和向度。时代允许的必然性是有，个人在时代话语面前的具体境遇也是有，二者或平行，或相交，或交融，乃至产生分歧对立，但无论如何，牵着人性和时代的信心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为帮扶者和帮扶对象激动雀跃或感动共鸣时，其实是在为中国大地上另一群人的命运祷祝。小说家做的就是忠实地守望，然后将守望的细节赋予文学的自由，那是人物终得解放的自由。

然而，这绝不是杨遥“扶贫”叙事的全部，在以“她和他们”为中心的边沿，“例外”出现了。杨遥在不经意间为这些“例外”保存了细节，他们将在这微型的细节中体认自我，感受生命的鲜活。《墓园》和《从前是一片海》是杨遥为中国的扶贫叙事史提供的两份标志性文学样本。它们都是短篇，但它们的品质和分量却不容置疑。

《墓园》中的陈继清，尽管女儿如愿考上大学，还享受了政府给的5000元助学贷款。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依旧“贫困”，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脱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恰在此时，村里的第一书记向陈继清伸出了救助之手。这得益于政策的机缘，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的信念与时代意志相互激发的现实图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继清具有无可辩驳的典型性。同样具有典型性的还有乡村医生梁欣。他在《从前是一片海》中露面之前，读者已经从旁人的叙述中勾勒出了这个“医疗扶贫模范”的基本轮廓。但我更关心的是梁欣露面之后。因为小说一再暗示，梁欣的“失踪”与另一个人有关，他叫张小飞，是杀死一家三口子的犯罪嫌疑人。在此杨遥启用了一种新的叙事策略。该策略的基本主张是：张小飞必须保持“沉默”。张小飞符合我们对一个农村青年才俊的所有想象，我们甚至无法在他的身上找到于连或高加林的半点性格缺陷。但偏偏是他，被指认为“杀人犯”。这个叙事动力的发起者，始终在不紧不慢地制造语言的迷宫，他要在意义不明的“复调”讲述中，为读者呈露人的复杂和盘踞于这复杂之上的“背景音”。张小飞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他和老母亲告别之后，医生梁欣陪他投案自首，接受审判。但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盘点汇集在这篇小说中的诸种声音，或许会听到那个响彻天宇的巨大背景音。它带着历史的疼痛，穿行于宏大的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治愈了无数身体的医生梁欣，也不得不承认：人，实在是太渺小了。

那么，面对沧海桑田的自然节律，人将何为？个体又怎样在人类事务中认领自己的生命和价值？我们是否找到了认领的尺度？……这一系列的问题，考验着小说家杨遥，也考验着我们。所幸，他已经试图在书写中努力做出回答。